

隋代佛教 窟龕研究

〔韩〕梁银景 著

考古新视野丛书



204

文物出版社



新 视 野 丛 书

隋代佛教 窟龕研究

● [韩] 梁银景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振钢

周小玮

责任编辑:王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代佛教窟龕研究/梁银景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2
(考古新视野丛书)

ISBN 7-5010-1677-1/K·872

I. 隋… II. 梁… III. ①佛教—石窟—研究—中国—隋代
②佛像—石刻造像—研究—中国—隋代 IV. K879.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2434 号

隋代佛教窟龕研究

梁银景 著

文物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100009)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尚艺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850×1168 1/32 印张:8.125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0-1677-1/K·872 定价:28.00 元

内容提要

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佛教,开窟、建寺、写经和造像等活动非常兴盛。隋代窟龕均分布于中原北方地区,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一是以邺城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即东部地区;一是敦煌莫高窟。

东西部窟龕在发展阶段上大体同步。第一阶段,各个地区仍沿袭南北朝晚期特点。第二阶段,二者基本上还承袭第一阶段,但新出现许多特点,这一点上莫高窟比东部地区更明显。第三阶段,二者还沿袭第二阶段,新出现向唐过渡的特点。

隋代佛教窟龕的特点是:第一,隋代佛教窟龕承前启后的特点很强。基本上仍沿袭了南北朝因素,北齐、北周的特点融合,有的因素还影响到唐初。而且隋代还出现新的因素,沿袭到初唐。第二,隋代佛教窟龕仍然存在地域性。东西部地区仍保留南北朝晚期特点。山东和晋冀豫两个地区之间互相影响并产生变化与发展。莫高窟受两京地区影响较大,变化很明显。第三,造像样式的本土化、现实化。佛像交领式袈裟着衣方式,钩钮式袈裟,菩萨像裙腰上升到胸部高处,菩萨像下身佩戴大佩或小佩,均模拟当时僧人、妇女的常服。第四,佛教的民间化。隋代参与开凿洞窟、摩崖龕的供养人老百姓逐渐增多,这种现象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专家推荐意见

梁银景是来自韩国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攻读佛教考古学。她本科阶段在韩国釜山大学学习考古学,受到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和考古实践的全面训练。硕士研究生阶段在韩国东国大学攻读美术史,侧重中国佛教美术史。她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中国山东青州驼山石窟隋代窟龕的调查与研究。后来她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修,系统地学习了中国汉唐和宋元考古学,并旁听了若干专题课程。此后她又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攻读佛教考古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她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佛教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汉文佛教典籍与目录、中国历史与文献、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佛教石窟寺调查等课程,为她进入博士论文的写作与研究,奠定了较好的专业基础。

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隋代佛教窟龕的分期与研究。以往中国学者多注意南北朝阶段和唐代两大高峰时期佛教窟龕的研究,由于隋代仅有三十多年,因而关于隋代佛教窟龕系统的综合研究不多。但是隋代佛教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得到较大的发展,遗存的佛教造像和窟龕也很丰富。而隋代正是从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分裂,复又归于一统向唐代的过渡阶段。很多唐代初期佛教窟龕的特点,在隋代已见端倪。因此隋代佛教窟龕的研究,填补了这一阶段若干石窟研究的空白。在中国石窟寺考古研

究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本书中,东部地区的隋代佛教窟龕的分期与研究,前人尚未涉及。她对敦煌隋代洞窟的若干题材出现的历史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如敦煌隋代流行的联珠纹纹饰,不是直接源于西方的中亚,而是先传入中原中心地区,然后再从长安地区反馈到敦煌的。壁画的题材内容,与两京地区关系密切,或者说受到两京地区(特别是长安地区)的强烈影响。她还从历史文献中发现,不少南朝上层人物流入西北地区,不可避免地带来南朝文化和佛教艺术的影响。这些新的观点,不能说全部正确无误,但是可以启发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注意敦煌地区隋代佛教窟龕和中原地区及南朝南方地区的关系。

作为一位外国人,又是一位女士,从事需要现场实地调查的石窟寺考古学研究,碰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文中所涉及的资料,凡是开放允许看的实物资料,她几乎全部作了现场的核对与调查。那时她尚需照顾年幼的女儿,她是带着孩子去现场考察,并完成全部资料的收集与核实的。因此她的敬业与吃苦的精神,很令人感动。

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当她的博士论文出版之际,特作如上推介。

馬世長

2004年于京北育新花园

目 录

绪论	1
一、研究动机与研究状况回顾	1
(一)研究动机	1
(二)研究状况回顾	3
二、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7
第一章 隋代东部地区窟龕的分期与特点	13
一、晋冀豫地区	13
(一)窟龕的类型	13
(二)窟龕的分组与分期	32
二、山东地区	43
(一)窟龕的类型	43
(二)窟龕的分组与分期	53
三、东部地区隋代窟龕的特点	60
(一)东部地区隋代窟龕的比较	60
(二)东部地区隋代窟龕的特点	68
第二章 莫高窟隋代洞窟的分期与特点	81
第三章 隋代佛教窟龕的特点与历史背景	101
一、隋代佛教窟龕的特点	101

二、隋代佛教窟龕演变的历史背景	107
(一)东西部地区窟龕之间出现共同点的 若干历史背景	107
(二)东西部地区窟龕之间差异的若干历史背景	110
第四章 隋代佛教窟龕几个问题的探讨	125
一、隋代窟龕造像的本土化和渊源问题	125
(一)隋代窟龕造像的本土化	125
(二)隋代窟龕造像的渊源	132
二、莫高窟隋代壁画题材与南朝、两京地区	149
(一)莫高窟隋代壁画种类、与前期之联系	150
(二)莫高窟经变画出现的历史背景与来源	169
三、莫高窟隋代洞窟开凿与隋王朝西域经营成功	181
(一)莫高窟隋代洞窟联珠纹的种类	182
(二)莫高窟隋代洞窟联珠纹的来源	190
(三)莫高窟隋代洞窟联珠纹的出现及其历史背景	196
附表 1	212
附表 2	213
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49

绪 论

一 研究动机与研究状况回顾

(一)研究动机

隋代的历史虽然短暂,却结束了几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隋文帝、炀帝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直沿袭到唐代,可以说隋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朝代。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佛教,下诏复兴佛教。在他们积极推行佛教的政策下,开窟、建寺、写经和造像等活动非常兴盛。隋代佛教以长安、洛阳为中心,与东西部及江南有频繁的交往。这对佛教窟龕产生一定的影响。隋代石窟均分布于中原北方地区(图1),继承北齐、北周开窟地点,以安阳、敦煌为中心开展开窟活动。而在今山东、山西、河北地区,虽有开窟活动,却没有像莫高窟那样经历整个隋王朝的大型洞窟。

隋代的佛教窟龕具有过渡性特征,即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特征,并对初唐以后产生影响。认识这种过渡性的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这种过渡期就不会有以后的新的要素出现。所以,南北朝时期石窟和造像在隋代是以什么形式被继承,是如何相互融合,在唐朝样式出现之前是以什么形式持续着,这些问题非常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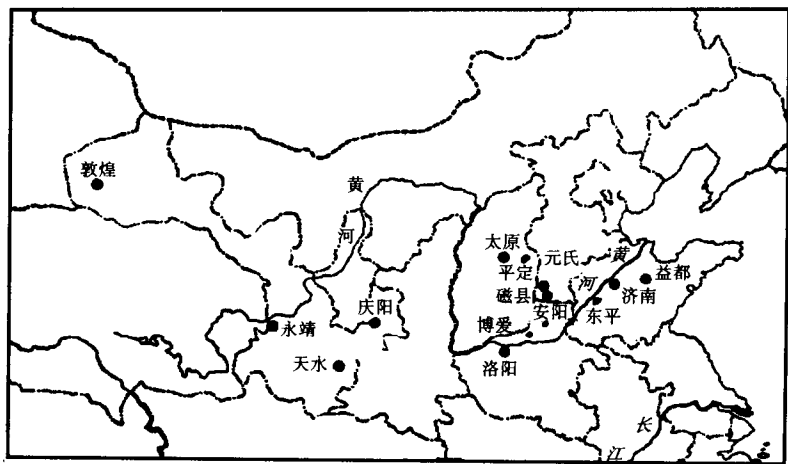


图1 隋代佛教窟龕位置图

山东青州(古代:益都):驼山第2窟、第3龕、云门山第1、2窟,济南:千佛山、龙洞、玉函山、东佛峪寺,东平:白佛山第1、2龕。河南安阳:大住圣窟,洛阳:龙门石窟隋代龕,沁阳:千佛洞,博爱:石佛滩隋代摩崖龕。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隋代龕,元氏:封龙山第3窟,曲阳:八会寺刻经龕。山西平定:开河寺摩崖佛,太原:天龙山第8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第8窟,天水:麦积山第5窟,敦煌:莫高窟。

要。迄今为止,许多学者对北魏佛教石窟和造像、南北朝时期南朝文化对北朝产生的影响、唐代石窟和造像等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对隋代佛教窟龕具体的传承关系、各区域窟龕之间的关系、真正的隋代特有的因素等几乎没有具体研究的文章。

由于民间佛教的兴盛,隋代中小型龕的雕凿较盛行,其数量最多而规模最大的地点为今山东地区,河南地区也现存不少的小龕例子。这些龕反映出当时老百姓的崇拜对象和民间工匠的雕刻水平。龕的开凿活跃是隋代佛教窟龕的另一特点,这是在南北朝时期不具备的。

长安、洛阳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在佛教和佛教窟龕方面起到中心作用。所以了解隋代长安、洛阳地区佛教特征,对

理解隋代佛教窟龕是重要的。

隋王朝统一全国后,南北文化进一步融合,在佛教窟龕方面,反映在东部地区佛教窟龕造像样式的变化主要受长安地区的影响,西部莫高窟隋代洞窟新出现而极盛的经变图、联珠纹等特点则可以说是两京地区、南朝文化西传的结果。但是,至今对隋代佛教窟龕方面出现的南北、东西融合的特点,进行具体研究的论文还不多。

(二)研究状况回顾

1. 东部地区窟龕研究状况

该地区隋代窟龕一般均有可靠的纪年题记,是隋代窟龕分布的重点区域。本区又自然形成山东地区和以邺城为中心的晋冀豫地区两区。山东地区以济南、青州、东平为中心,隋窟数量虽然不少,但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是因为除青州驼山第2窟、千佛山第6、7窟之外,一般洞窟都为龕形洞窟或利用天然洞窟、崖面开凿的龕,且规模不大。

山东地区窟龕调查和研究工作是从国外学者的工作开始的。瑞典著名东方美术史学家喜龙仁(Oswald Siren, 1879-1966)^①、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 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②、日本学者关野贞和常盘大定^③,多次来华考察名物古迹,对山东地区隋代窟龕进行调查,并作了概要的描述。其中日本学者对山东窟龕进行了较详细的文字记录和照相。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荆三林、张鹤云、阎文儒等先后对济南、青州一带窟龕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发表了几篇文章^④。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关该地区窟龕的研究论文陆续问世^⑤,对个别石窟铭文题记进行分析,并对佛教造像题材所反映的佛教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调查和研究范围也超出济南、青州两地。最近发表的文章以李清泉对济南隋代摩崖龕的研究为代表。利用考古学方

法,作了分期并归纳出特点,虽然未能与山东其他地区、东部地区窟龕进行比较,但是调查的资料较全面,为该地区隋代窟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⑥。

80~90年代,诸城市、青州市发现一大批佛教造像,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相关论文也陆续发表^⑦。此后,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该地区佛教造像研究,然而有关研究仍显薄弱,没有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的综合研究。

晋冀豫地区隋代石窟有山西天龙山第8窟、河北封龙山第3窟、河南大住圣窟、悬谷山千佛洞,小龕像有开河寺摩崖龕、南北响堂山造像龕、八会寺刻经龕、龙门造像龕、石佛滩,其中除封龙山第3窟外都有明确铭文题记。

这些隋代窟龕中,安阳大住圣窟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开展较早。1914年中国学者顾颉光开始调查此石窟后^⑧,1920~1921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对宝山、南北响堂山、水浴寺等石窟进行了调查^⑨,1934年滕固、北平研究院又调查了上述诸石窟^⑩。但他们调查主要偏重于文字记录、摄影等,调查结果也均极简略。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研究以安阳、邺都为中心的北齐石窟,其中包括大住圣窟^⑪。1991年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对大住圣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作了摄影、绘图、拓本和一些研究工作,其成果见于《宝山灵泉寺》一书^⑫。虽然比照实物,发现该书有讹误之处,但该书至今还是大住圣窟最为代表性的参考资料。

山西天龙山石窟规模弘大,雕刻精美,早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已有不少论文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⑬。然而喜龙仁、常盘大定、田中俊逸等的考察导致佛像被盗毁。此外,前人的研究多注重各个洞窟的断代和对流失于海外的造像片进行位置复原。因此从北齐、唐代洞窟造像样式来看,还可说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不足。最近李裕群在有关论文中从考古学角度对天龙山石窟进行了分期研究,并讨论了天

龙山石窟与太原附近其他石窟、寺院的关系、南北朝佛教历史与天龙山石窟的联系、太原与邺都的关系等问题^④。

到目前为止,天龙山石窟研究一般集中于北齐和唐代。虽然我们很清楚隋584年题记的第8窟在石窟形制、造像样式上仍继承北齐,但对开窟者与石窟之关系、石窟形制来源问题研究不深。河北、河南地区石窟研究也不例外。国内外学者迄今对河南、河北地区石窟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北魏龙门石窟、北齐响堂山石窟,那些规模不大的隋代石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晋冀豫地区石窟最近被调查并刊登了几篇考察文章^⑤,没有综合性的研究。晋冀豫地区龕像数量并不少,而且均有明确铭文题记,但目前只对个别摩崖佛、龕像进行了调查^⑥,对该地区隋代小龕也没有综合性研究。

隋代首都位于长安,隋皇室和贵族注重地上佛寺活动,隋王朝的南北统一,这些因素可能对隋代东部地区带来不少的影响。尤其是以邺城为中心的窟龕和在该地区活动的高僧似有承传关系。所以该地区窟龕是隋代佛教史、特别是北齐邺城地区佛教到隋代的承传和发展的新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随着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隋后期洛阳佛教可代表全国佛教之重点。不过包括龙门石窟在内,没有大规模的开窟活动。

2. 西部地区窟龕研究状况

隋代中原北方地区石窟数量不多,但隋代洞窟莫高窟却很多,共计90多个。从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写经、绘画后至今,有关莫高窟的研究论文大量问世,对壁画内容、塑像特点、颜料来源、出土文书等进行了很多讨论。尤其是国外学者注重研究唐代壁画、初创洞窟的西来因素、颜料的西域因素等,强调莫高窟中的西域因素。因此,在石窟塑像、壁画、出土文书等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于石窟考古,1956年,宿白先生用考古学方法对魏窟(北魏、西魏、北周)进行了分期^⑦。此后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在宿白先

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整个北朝石窟作了深入研究工作^⑧。樊锦诗、关友惠、刘玉权通过对洞窟形制、塑像特点、壁画、图案纹样的分类排比,将隋代洞窟分为三期^⑨。李其琼也对隋代石窟形制、彩塑、壁画、供养人画像、图案装饰作了综合研究^⑩。此后李崇峰、赵青兰等对北朝、隋、唐代洞窟作进一步的分期研究工作^⑪。但从石窟考古角度上,综合研究隋代莫高窟的文章很少,虽然作了详细的分期,却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如樊锦诗等认为真正的隋代因素出现于敦煌第二期,即590年~612年,并提出了二期出现的许多因素如双层龕口、壁画二段布局、三世佛题材、各种经变画、塑像表现丝织品的纹样等,但是没有研究第二期出现的这些特点的原因、来源、对隋末唐初的影响关系等。

除了莫高窟之外,西部地区隋代石窟还有固原须弥山第67、70窟、麦积山第5窟、炳灵寺第8窟、庆阳北摩崖龕等,不过由于没有明确的纪年题记,规模也不大,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庆阳北隋代摩崖龕风化严重,几乎无法判别龕形窟的具体年代。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须弥山石窟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开展较晚,1956年才首次披露于世^⑫。此后对须弥山石窟作的考察也极简略^⑬。8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与宁夏自治区文管会对该石窟进行了考察并且出版了《须弥山石窟》^⑭。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宁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全面调查了该石窟,并在1997年出版了《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⑮。中国学者陈悦新对北朝、隋代洞窟作了分期,考证历史背景与石窟的关系^⑯。

麦积山、炳灵寺石窟均由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考察^⑰,研究论文也多出自中国学者之手^⑱。50年代以后西方、日本学者开始对这些石窟提出自己的观点^⑲。此后,日本将主要研究方向转移到北齐石窟、南朝佛像,这与日本学术界动态有密切关联^⑳。

综上所述,中原北方地区隋代窟龕研究,以带铭文题记的石窟

即天龙山第8窟、大住圣窟、开皇年间的山东窟龕、敦煌莫高窟90多个隋代洞窟为中心发表了不少论文。但是主要侧重于某一窟龕的研究,对于隋代窟龕进行全面、系统、综合性的研究很少。隋代窟龕不像北魏、唐代石窟那样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因为隋代没有以皇室为中心开凿的规模宏大的石窟,且隋王朝历史很短,学者们认为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出现新的因素。

二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西部地区隋代窟龕数量不多,而且仍继承南北朝石窟开凿地点。长安周围的隋代窟龕保存很少,敦煌莫高窟的隋窟数量则很多。除了莫高窟之外,西部地区隋代窟龕主要有炳灵寺第8窟、麦积山第5窟、须弥山第67、70窟、庆阳北小龕等几处。但是数量少,分布也很分散,而且没有明确的隋代纪年题记。所以,本书的讨论不包括这些西部地区零散的窟龕,主要涉及隋代敦煌莫高窟。

与西部地区不同,东部各地区都有隋代窟龕。尤其是山东地区数量较多,是隋代纪年窟龕分布最为密集的地点。而且山东地区窟龕开凿地点多为唐代所承袭。隋代邳城附近仍为窟龕开凿比较活跃的中心区域之一,规模较大的洞窟代表有安阳大住圣窟,小龕像主要是利用前代开凿的南、北响堂石窟内外空间雕造。此外,它还主要沿两条线发展和延伸:南侧为豫北太行—洛阳线,北侧为冀晋线。豫北太行—洛阳线,隋代洞窟仅有沁阳市千佛洞,小龕主要分布于龙门石窟小龕、博爱县石佛滩。冀晋线,规模较大的洞窟有元氏县封龙山第3窟、太原天龙山第8窟。此外,曲阳刻经龕、平定县开河寺摩崖佛属于龕像或摩崖佛。

此外,四川地区隋代窟龕分布较零散,至今还未有正式调查报告^⑧。从文献记载来看,隋代南朝地区造像活动仍然盛行,但是到

目前为止没有公开发表的隋代窟龕报告。因此本书讨论的范围是中原北方地区。

本书以窟龕作为研究对象,因而不包括塔、单体造像及造像碑资料。

本书所采用的资料,都是近年来实地调查、记录所得。由于有些石窟造像资料,因各种原因被毁坏,所以在使用资料时也参考了前人的著录和研究成果。

本书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首先从各区窟龕的类型着手,进行分类排比,找出其演变发展关系,进而对各区窟龕作分期与年代探讨。在此基础上,作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找出各区之间的异同关系,最后对区域成因进行综合分析。

-
- ① 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25 年。
 - ② E. É.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Leroux, 1909~1915 年。
 - ③ 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4,佛教史迹研究会,1927 年;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文化史迹》四,法藏馆,1939 年。
 - ④ 荆三林《济南近郊的北魏隋唐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9 期,22~39 页;荆三林《关于济南近郊的北魏隋唐造像的初步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 3 期;张鹤云《济南石窟摩崖造像》,《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57 年 1 期;阎文儒《云门山与驼山》,《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 10 期,30~33 页;荆三林《济南郊外历代石窟及摩崖造像》,《现代佛学》1958 年 5、6 期,17~21,20~22 页。
 - ⑤ 阪井卓《神通寺千佛崖の唐代初期造像について》,《佛教艺术》159,1985 年,63~76 页;泰安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东东平白佛山石窟造像调查》,《考古》1989 年 3 期,231~233 页;陈丰东《山东隋代石窟艺术探析》,《南开大学学报》1992 年 5 期,69~75 页;张总《白佛山等十六王子像概述》,《敦煌研究》1998 年 3 期,28~33 页;张总《北朝至隋山东佛教艺术查研新得》,《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 年,61~81 页;梁银景《对中国驼山石窟佛教雕刻考察》,《佛教美术研究》2,韩国佛教美术文化材研究所,1995 年,123~148 页;李裕群《驼山石窟开凿年代与造像题材考》,《文物》1998 年 6 期,47~56 页;张总《山东历城黄石

崖龛窟调查》，《文物》1996年4期，37～76页；李清泉《济南地区石窟、摩崖造像调查与初步研究》，《艺术史研究》第2辑（2000年），329～442页。

- ⑥ 李清泉《济南地区石窟、摩崖造像调查与初步研究》，《艺术史研究》第2辑（2000年），329～442页。
- ⑦ 有关诸城出土佛教造像有如下的论文：诸城市博物馆《山东诸城发现北朝造像》，《考古》1990年8期；松原三郎，《山东省出土的佛像》，《古美术》99，1991年；杜在忠、韩冈著、康培仁译《山东省诸城出土的石佛像について》（一），《古美术》99，1991年；松原三郎《诸城派石雕考—南北朝样式上的位置に就て》，《古美术》101，1992年；松原三郎《山东地方の北朝石像の一考察—诸城出土の在铭像二体を中心として》，《古美术》101，1992年；杜在忠、韩冈著、康培仁译《山东省诸城出土的石佛像について》（二），《古美术》101，1992年；杜在忠、韩冈著、康培仁译《山东省诸城出土的石佛像について》（四），《古美术》103，1992年；杜在忠、韩冈《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学报》1994年2期。
- 有关青州出土佛教造像参考如下文章：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2期，4～15页；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1999年，14～23页，又刊于《文物》1999年10期，44～59页。
- ⑧ 范寿铭主纂、顾颉光辑著《河朔访古新录》卷一至卷三，上海天华印务馆，1930年。
- ⑨ 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3，佛教史迹研究会，1927年；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文化史迹》5，法藏馆，1939年；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龙吟社，1938年。
- ⑩ 滕固《征途访古述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18～23页；徐炳昶《唐王岐及宝山调查报告》，《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七卷第四期，97～110页。
- ⑪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4期，1～13页；丁明夷《北朝佛教史的重要补正——析安阳三处石窟的造像题材》，《文物》1988年4期，15～20页；丁明夷《巩县天龙响堂安阳数处石窟寺》，《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3·巩县天龙山响堂山安阳石窟雕刻》，文物出版社，1989年，26～51页；李裕群《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的石窟寺》，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李裕群《郾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4期，443～478页。
- ⑫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宝山灵泉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⑬ 中国学者的论文有：罗哲文《太原天龙山·蒙山的几处石窟和建筑》，《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4期，50～54页；阎文儒、阎万石《天龙山石窟》，《井州文化》1982年10期，26～27页；李裕群《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1期，32～55页；李